

思 悟 录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小序

走过求学之路、企业之路、从政之路……本有心为人、无心为文，有意为众、无意为“官”……然一路走来，心有所得、思有所悟，学无涯、行无涯、思亦无涯……

如能观照当时背景，“所述殊不与人同”，时时多有超前，因而常常“不合时宜”。坚持尽量说真话、办实事，实在不行就不说话，至少不故意说假话、办劳民伤财之事……

“记述不妨如实写，中和平淡味弥长。”但求“货真价实”，是自己的所思所悟所得所述，或为自撰，或为脱稿或即席讲话之录音、记录整理成文，不是照本宣科、念写好的稿子，亦非人云亦云……

作 者

2006·春

科学发展观的两个来源与四个组成部分^{*}

(2005年12月)

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跨入新时期新阶段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我们在今后实践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发展观是有关发展的认识与理论,其内容主要包括发展要遵循的规律,发展的目标、内外动力,对发展的价值评价体系,以及发展的路径选择等。发展观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着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发展观的完善与发展,是对经济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借鉴与提升。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内容、发展的水平、发展的过程等重要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我理解,它有两个来源与四个组成部分。

^{*} 载于《群众》2007年第2期。

科学发展观的两个来源

第一，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发展观。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形成了各具时代特点的发展观。纵观这些发展观的沿革，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其不断深化、不断完善、不断前进的过程。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发展观：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新中国是在长期战争留下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建国初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之后，1952年底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6年4月25日和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个体现着鲜明的发展观的著名论著，提出了“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尤其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周恩来同志在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观点。“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这就是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发展观。虽然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统筹、协调发展的思想。当然，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极度混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世界上任何经济学成果都批判成封、资、修的东西，这个时期也就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发展观了，经济理论上出现严重倒退。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实现了党的中心工作的历史性转移，党的工作重心真正从“阶级斗争为

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发展观,这一观点后来进一步强化成“发展才是硬道理”。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是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语言通俗、理论性强、振聋发聩,是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背景下、针对当时存在的“左”的思想尤其是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以其高度的政治智慧还提出“不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切合当时经济社会和人们的思想实际,切合时空背景和发展规律。在这一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迅速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崩溃的边缘”恢复过来,全党和全国人民很快从“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我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时期。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观,决不是单纯发展经济、单纯追求高速度的发展观。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不仅经济要搞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发展观: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强调指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

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并把发展的内涵拓展到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毫无疑问,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同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的发展观一脉相承的,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与突破。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着重解决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当要发展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之时,针对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新时期新阶段所急需解决的则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于是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

第二,来源于经济学有关发展观的理论成果。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品质。科学发展观借鉴与提升了经济学研究的有益成果。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观也是逐步深化完善的,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我借用四维空间作简要概括。

——单维的发展观:发展=经济增长。把发展局限于经济发展,又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从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标志古典经济学诞生以后相当长的时期,经济学关于发展的理论基本秉持这一观点,这是经济社会状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这种发展观在时间上主要存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历史时段,在空间上主要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把发展单纯归结为物质产品积累的发展观越来越付出沉重的经济、社会、环境、资源代价,这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百多年过去了,在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不少人对发展的理解还停留在这一阶段,认为有总量、

有速度就是发展了,乃至演变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GDP崇拜”、“数字出官”等等怪现象。

——两维的发展观:发展=经济增长+结构改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暴露出许多问题,发生“牛奶倒入大海”这样的糟蹋财富、资源的怪象,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的反复出现,造成社会财富的无端浪费,引起了对经济内部结构的关注与思考,人们认识到结构性矛盾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没有结构的改善,难以维持健康的经济增长。由此,开始注重改善经济内部结构,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进行结构调整,追求速度与结构的协调与统一。这时发展观从线状单维发展到平面两维,即发展=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改善。

——三维的发展观:发展=经济增长+结构改善+社会变革。到20世纪70—80年代,发展观的内容又有了新的变化。在同一经济体内部,在不同经济体包括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领域的效率问题与社会领域的公平问题日益显现,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从经济内部结构延伸到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认为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它是包括经济体制、国家制度以及社会公平、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过程。类似我们在经历“非典”之后得到的启发,经济发展不能脱离社会事业“单兵冒进”。于是,发展观又从平面形态的两维拓展为立体空间形态的三维,加入了社会变革的内容,即发展=经济增长+结构改善+社会变革。

——四维的发展观:发展=经济增长+结构改善+社会变革+可持续。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引起有识之士的深刻忧虑。物理学领域不可能有“永动机”,可是地球上只要有人类生存,就应当追求一种持续、永恒的健康发展。以1987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委员会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宣言为标志,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人

类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去追求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别国、别地的利益为代价去追求一国、一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多方面得到延伸和阐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这时,现代发展观又从立体三维空间加上了时间维,进一步拓展到四维,即发展要能随时间永恒延续。

科学发展观借鉴了经济学有关发展观不断进步的四阶段成果,并有重大提升与扩展,尤其是鲜明地提出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宗旨与根本目的。

科学发展观的四个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主要从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内容、发展的水平、发展路径与过程四个重大问题展开,涵盖了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所涉及的各方面的丰富内容,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要求处理好发展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解决的是发展目的的人本问题。发展是硬道理,但许多人甚至淡忘了发展依然只是手段,尽管它是十分重要的手段。而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民生民利,是最广大人民的富裕幸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谁又是社会的主体?是人!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追求,为人民服务正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党宗旨。“以人为本”诠释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深刻内涵,体现了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包含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最广泛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应有之义,涵盖了提供发展动力与人才支撑、加强能力建设等许多重要内容,也提出了执政者是否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在为民执政方面能力与水平是否合格等严肃课题。

——发展的内容：全面发展。“全面”更多的是要求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解决的是发展内容的全面问题。全面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也具备了现实可能。建国以来，我们所走的是“非均衡发展”的发展道路，这是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作为起步于贫弱的发展中大国，均衡发展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否则就会丧失宝贵的发展机遇。但非均衡发展也有度的限制，过度非均衡也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风险。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国家实力明显有所增强的基础上，适时提出全面发展的理念，是审时度势、科学判断的重大转折。全面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成果一起要”前进到“四位一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

——发展的水平：协调发展。“协调”更多的是要求处理好“快”与“好”的关系、“加快”与“协调”的关系，努力做到“又好又快”、“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解决的是发展水平的统筹协调问题，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发展的协调，东部、中部、西部等各地区发展的协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协调以及三次产业各自内部速度与结构、效益的协调等。也包括各种关系、利益的协调。比如从自然层面看，包括人类发展与自然承载力的协调，使人类的活动更加符合自然规律。“人定胜天”是有一定限度的，至今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项“胜利”都有可能遭到大自然的加倍“报复”，应尽力追求人与自然友好和谐。从社会层面看，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自身不同群体间的协调，促进社会安定和谐。从经济层面看，包括个体、团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地方与中央的

协调,消费、投资、出口三大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经济关系的本质是协调利益关系。从法律层面上看,包括人们自身利益与社会公益、私利与公利的协调,要完善法律法规与必要的政府宏观调控,既要毫不含糊地保护私有财产、不允许随意侵害私利,又要防止追求私利的冲动侵害公益,等等。协调包含了深化改革、调整关系、完善体制机制、实现人治到法治的重要转折等重大问题。

——发展的过程：可持续发展。“可持续”要求处理好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当前发展与长远、持续发展的关系,当代人发展与后代人发展的关系,当前增长与持久竞争力培育的关系,解决的是发展过程的可持续问题。要求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状况,加强环境保护,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与综合竞争力。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发展路径从“招商引资、贴牌生产”为主到“自主创新、自立品牌”为主的转变,进入工业化阶段从传统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着力追求并尽快实现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与经济效益高、消耗低、污染排放少、安全有保障、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两高两低一保一充分”的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目标模式。可持续发展包含了发展路径选择、核心竞争力培育等重大问题。“十一五”规划提出空间功能区分类,设定约束性指标,突出资源环境,着力自主创新,都是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

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作为理论创新的成果,科学发展观必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党的执政理念的进一步升华。从今往后,应当将发展分类为对的发

展与错的发展,科学是判断对与错的标准,必须坚持只有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科学的发展已经不再是硬道理。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的和平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福祉、中华民族的振兴,必将展现更加灿烂的新前景。

四大基本判断与五项战略举措^{*}

——对形势和策略的宏观观察与思考

(2005年3月)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按照党的十六大描绘的宏伟蓝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力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集体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审视和判断形势,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事关中国改革发展和民族振兴大局的重大战略举措。从宏观角度观察思考、分析理解,可以概括为“四大基本判断”和“五项战略举措”。

四大基本判断

——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世界经济发展有个一般规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个区间,经济社会将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面临一个关口。在这个时期,如果发展战略、发展方向、政策取向、重大决策与世界经济、本国国情结合得比较好,选择比较准确、科学,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新的起跑线,步入“黄金发展期”,取

^{*} 该文主要内容载于求是杂志社《红旗文稿》2005年第16期。

得快速、健康的发展。如果战略选择发生差错,就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出现经济倒退,金融崩溃,甚至社会动乱。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经济结构加速调整;经济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深化改革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我国经济同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外向依存度不断升高,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明显加深;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多样化,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社会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网络、手机、多媒体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处于这样的关键时期,我们既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面临各种困难和风险,既有难得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能不能抓住新机遇、解决新问题、实现新发展,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大考验。

——必须正视现状与发展中遇到的矛盾

在国际国内我们至少各面临两大突出矛盾。在国际上面临来自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压力。在政治上主要是制度冲撞的矛盾。中国的社会制度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摸索找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我们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地球村”中属于“少数派”,而且这个状况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世界在走向多极化,但“一

超独强”的局面在一定时期内也同样难以改变。我们坚信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但西方也在坚持他们的价值观,并有加大其输出力度的趋势。两者的分歧与碰撞难以避免,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特别在“苏联、东欧剧变”以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缓冲屏障,在政治上受到“西化”、“分化”的压力不可低估。比如西方的武器禁售,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歧视。还有各种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汇率压力,在经济背后,都有政治根源。在经济上存在资源压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过于依赖投资与资源消耗。资源消耗与经济总量很不相称。水泥、钢材、煤炭、铁矿砂、氧化铝、电力、原油的消耗份额超过经济总量在世界中份额的几倍甚至近十倍。在资源问题上,我们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们去年的原油进口量超过一亿两千万吨,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原油进口超过了一亿吨以后,它已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经济安全、国家安全问题,是外交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军事问题。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有些资源,如煤炭、石油经过上千万年沉积生成,是不可再生的,总的来说是越用越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所以我们的石油战略如此引起各国的关注,甚至有的国家处处刻意设置障碍。

在国内也面临两大矛盾。在经济层面,存在经济增长快和好的突出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曾经提出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把“多快”放在前面,这是针对当时的短缺经济提出的,主要是解决量的问题。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走出短缺经济,绝大多数商品供大于求,现在需要在继续保持量的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质的提高,使经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现在到了要把好放在前面的

时候,又快又好、好中求快、快中有别、以好保稳。单纯求快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煤电油运等生产要素供应紧张造成新的资源性短缺经济,环境资源承载力遇到严峻挑战,社会和谐稳定面临新的重大课题。中国经济快和好之间的矛盾已经相当突出。在社会层面,存在各种利益关系协调的突出矛盾。计划经济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关系,那时候对人的管理一讲“阶级斗争新动向”就管用,其实那是一种高压态势,是不正常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利益关系。利益关系不协调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和谐,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现在社会上存在的社会和谐现象有种种原因,其中主要的还是利益关系不和谐造成的。利益关系的背后就是收入分配关系,分配关系处理不好,利益关系就处理不好。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现在的状况是平均主义和差距过大相互交织,无论从薪酬性收入还是从财产性收入分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在扩大,衡量收入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不少群众生活还非常困难,甚至出现了“赤贫”人群,某些领域的社会矛盾呈现扩大和上升的趋势。促进充分就业、调整分配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兼顾公平,再分配注重公平兼顾效率,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是为初次分配做环境、为再分配出政策,再分配的关键是扶贫扶弱。调整好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对我们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面临新的路径选择

快与好是一种选择,民族性与世界性是一种选择,“拿来主义”与自主创新更需要正确选择。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投资环境持续优

化,比较成本优势日益显现,已经成为世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招商引资对我们快速增加经济总量,引进先进管理理念和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推动市场的日趋活跃,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开放初期中国这样资金少、底子薄、劳动力多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外资进入,我们难以保持这么多年的快速发展与经济总量的增加。但同时,我们招商引资也是付出代价的。比如税收优惠、低地价、低劳动力成本等等,已经不是WTO要求的国民待遇问题了,而是超国民待遇。我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在做打工者,只赚取了产品成本中的活劳动含量,而附加价值、优势利润全被拿走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付出了环境、资源的高昂代价。我们用自己的土地承载了别人在获取优势利润时留下的环境污染,我们消耗了自己宝贵的资源为别人创造剩余价值。我们自己的品牌消失速率快于新生速率,我们总体上让出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得到根本提升。除了这些有形的代价,还有有关民族创新精神的无形代价。如果说这些都是我们在发展的某个阶段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做出新的发展路径选择的阶段了:在继续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和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自主创新、自主创造、自主创业。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市场换技术”、“以金钱买技术”这句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是个误导。市场换技术、花钱买技术,效果都是有限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已经让出了不少市场,但为什么没有换来多少技术,尤其是尖端的、前沿的、附加价值高的核心技术。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故事很能说明个中原委:老虎向猫学本领,猫的最后一招——爬树,肯定不会教给老虎,否则老虎学会后猫早就灭绝了。正因为猫的绝招不教给老虎,所以猫才繁衍至今。

同样道理,在全球技术市场上,凡是高赢利、卖产品比转让技术更划算的,核心要害的、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技术,都是花钱买不到的,也是市场换不来的。在我们搞市场经济之后,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和我国加入 WTO 以后,有一种说法认为不存在民族工业的概念。这种观念也是极端错误的。先有民族性才有世界性。一个民族假如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在世界上就是没有地位的民族。民族性的物质载体就是民族产业、民族产品、民族品牌,民族性的精神载体就是民族文化。跨国公司无国界,但跨国公司有“国籍”,这就是民族性。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民族品牌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否则我们只不过是跨国公司、外国品牌的加工“车间”。跨国公司的制造工厂是“轮子上的工厂”,随时可以向比较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条路要走,那就是自主创业、自主创新、自立品牌。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尖锐地摆在中国人的面前,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就是外来的,要能引得进、留得住、长得大,把“轮子”变为“树根”,升高其转移成本,也得靠本土配套、本土开发、本土人才、本土环境。

——我们又一次到了需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关系的重要关口

创新就是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无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正在突破前人,我们也欢迎后人突破我们。突破会产生新的发展空间、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集体产生之后,非常重视继承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重大战略思想、战略举措,同时又不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若干重要理念,实施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这些内容比较集中地包含在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中。我们对发展问题,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